



让青少年亲近文学,懂得诉说人生,不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作家,而是为了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健康成长,进入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,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、一个幸福的人、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
作文甚至语文的教育应该是最有温度的教育,应该让孩子们在水里火里,在人生里,在社会里,学会生活,学会理解,学会爱,而不仅仅是在作文纸上排列字句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让文学来叫醒作文

□施战军

在我的印象中,打我上中学那时起,中学作文的教学方式似乎就没怎么变过,老师会总结出许多写作文的模式让学生去模仿甚至背诵。我对中学作文的印象大概就一直停留在这种“新八股”的状态上。直到我参加今年“北大培文杯”决赛阅卷时,我才发觉这种印象略有误差。

我当时是看到了河南实验中学一个叫胡浩然的中学生的参赛作品《蒋扈氏》,它让我大吃一惊。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学作文的一篇很成熟的文学作品。小说写的是孙子蒋红涛和奶奶的故事,其间贯穿着蒋家难言的困苦历程。小说完成度之高,令人肃然起敬,让人能嗅到文字间有小说家师陀的味道。所以我在评语中写下了我的赞叹:“《蒋扈氏》是这个年龄段少见的小说上品。让我们记住胡浩然这个名字吧,他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好作家。”

这让我反过来思考,现在中学的作文教育肯定是有问题的,孩子们不缺乏才华,但他们的才华为什么不能在作文中体现出来呢?温儒敏教授说,主要问题一在于高考这个“指挥棒”,二是老师的问题。老师现在都不读书,怎么有能力教学生?有些老师的写作还不如学生。通常的教学方法只用灌输知识点的方式,文言文只讲字词不讲文以载道;美文讲授只重图解分析不重审美体验;作文课只讲谋篇造句不讲启迪思想……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,甚至让写作文成为学生的一种负担。

就像“北大培文杯”一等奖选手、新疆七十中的李蕤桐所说:“文字,是作者对读者的告解,是心灵的自我救赎。”而作文和写作的关系,就像“从脑袋上揪一根头发下来和剃一根手指头一样,难以相提并论”。文字应该是真实地记录生活,而不少高考作文的命题却往往让中学生一头雾水,写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物,让中学生不知从何谈起。

“写你所知道的。”“给心灵一个说话的机会。”这是创意写作耳熟能详的话语。创意写作强调“创意第一性,写作第二性”,首先强调言有物、言有意,其次才是遣词造句、谋篇布局的功夫。这个写作的道理不能搞反了,没有“说什么”的问题,哪会有“怎么说”?所以,我们强调让作文回归事物,让想象回归现实,回到文学的起点上来,让文学来叫醒作文。

写作能力的高低意味着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多大,甚至也可以衡量一个人对文化的理解程度。因此,写作不仅体现写作者基础知识的长度和宽度,更包含了他认知世界和理解社会的能力。在此基础之上,才能展现他感受人生、想象未来和编织梦想的能力。这是一种写作的美德。因此,最重要的是,让青少年亲近文学,懂得诉说人生,不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作家,而是为了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健康成长,进入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,有助于他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、一个幸福的人、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在这个程度上,正如曹文轩教授所言:“让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爱上写作,这是对中国教育的特别贡献。”

这种回归完全可以实现文学写作与中学作文的良性对接,要用文学的石子激活作文这潭死水,作文教育不能再装睡了,装睡的人也许偶尔会做梦,但是永远不能看到现实。作文甚至语文的教育应该是最有温度的教育,应该让孩子们在水里火里,在人生里,在社会里,学会生活,学会理解,学会爱,而不仅仅是在作文纸上排列字句。我们文学界应该和教育界一起担起这个责任,因为孩子是我们民族的未来,我们应该对青年有一个方向的引导,解放他们的想象力,提高他们认知世界的能力,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,进而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青年。

(本文作者为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)

【社会观察】

校庆与大学精神

□雨茂

不久前,商洛学院借校庆要求在校学生捐款一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。其实,把校庆搞成变相摊派,在中国的大学并不鲜见,摊派的对象一般是已经毕业的校友,但对在校学生变相收费的情况并不普遍。对前者,社会虽有反对声音,似乎尚能容忍;对后者,舆论却是一边倒地反对。究其原因,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能自主生活,怎能向他们索取钱财呢?

我开始反思校庆是在22年前,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书,适逢学校20周年校庆,我班同学作为观众参加了校庆典礼,至今记忆十分深刻。学校是为矿区培养师资的,学生毕业后一般到偏僻落后、生活艰苦的地方工作,被录取到本校的学生,情绪大多比较低落。新生入学后,学校花了大量的精力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,要求学生爱国、爱校、爱矿区,树立到艰苦地区工作的志向,对此,我们也没有异议,但校庆发生的一些事却让我们感觉受了愚弄。我们发现坐在主席台上的基本都是官员,少数是捐款较多的商人,没有一位在一线工作的老师,其中一位做县长的学长位列首座,因为毕业生中数他官最大、权最高。消息灵通人士传出话来,坐在主席台上的学长都有数额不等的捐款,不捐或者捐款少的学长,是没有资格坐主席台的。我当时就感到很滑稽,学校整天做思想工作让我们安心到矿区工作,校庆为什么不请在一线工作的校友现身说法呢?这难道不比单纯做思想工作有效得多吗?

工作后,我又经历了几次校庆,发现校庆的套路几乎一样,先公开发布消息宣传,号召校友回校庆祝,然后对位高权重或者家大业大的目标校友单独发出邀请,同时请老教师、班主任对他们大打感情牌。所有受邀校友一般都会收到捐资助学的请求,虽说金额不限,但校友们心知肚明,学校是要公布捐款数额的,有的还要张红榜宣传。校友中间也有攀比,拿得少,面子上过不去,还不能坐上主席台,

参加校庆不丢脸吗?让校友捐资,总得有个理由,设立奖助学金、改善学习与办公环境是还能说得过去的理由,有的就匪夷所思了,比如建立纪念雕塑、捐种爱心树、认领校友林等,有的干脆许诺将一座正在使用的教学楼冠以捐款最多的校友名字。约十年前,一所知名大学搞校庆,主席台按捐款数额排座次,一位校友捐了三万元,挤不进主席台,只能坐在台下做基本观众,他感觉受了屈辱,干脆不参加典礼,也不参加聚餐。其实,对于参加校庆的校友来说,伤了自尊的岂在少数!

有人认为校庆传统源于西方,从大学的发展历史看,当然是正确的,如果仅从庆典方面看,又是不确切的。中国一直就有逢五、逢十办庆典的传统,大学遵从的就是这个中国传统,与西方文化关联并不大。庆典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回顾历史、彰显价值、塑造形象……校庆也是这样。从这个角度看,校庆当然是需要的,核心问题在于怎样办校庆、办什么样的校庆。

校庆的主体应该是校友与在校师生,要注重自豪感与归属感的营构,而不能成为宣传个别所谓杰出校友的舞台。许多大学搞校庆,相互攀比的是嘉宾的行政级别与个人资产,为此,甚至不惜邀请一些并不是校友的人来充门面。为了排定座次,主办方大伤脑筋。校方还为认定的杰出校友搞专场报告会,而那些立足专业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校友却被冷落。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杰出,只是名气不够大罢了。这就给在校学生某种强烈的暗示,不成为达官、贵人、鸿儒,你就不杰出,将来连回校参与校庆的资格都没有。

大学要尊重传统,尊重办学规律,而不是什么跨越式发展与弯道超车。中国大学的历史并不长,但在发展过程中,也积累了许多治学、育人、办校的理念,涌现了不少前辈先贤,大学校庆应该深入挖掘这些资源,开办校史陈列馆,建造雕塑,以先

贤的名字和思想为校园的楼宇、道路、桥梁、花园命名。只有尊重传统,才能杜绝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。

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在于历史积淀,在于社会反馈。历史无法改变,社会反馈却可以通过大学自身的努力去影响。有些大学为了提高办学年限,肆意篡改建校历史,留下了许多笑柄;有些大学使用虚假的毕业生数据蒙骗大众;有些大学对所谓的杰出校友进行过度包装和宣传;有些大学夸大美化学校的社会贡献……完全抛弃了大学的价值追求。

最后,校庆应该彰显价值,价值往往浓缩在校训中。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,强调的是修身治学、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,既注重个人修养,又强调社会责任。清华大学以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为校训,强调的是砥砺前行、发奋图强、博采众长、大度包容的精神,仍然强调把自身修为与襟怀抱负相统一。这些理念与文化遗产及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,校庆的理念应该与上述精神相一致,而不能背离这些精神。

大学精神是什么?无论是蔡元培所谓的研究高深学问,还是孙中山所说的“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”,立足的还是大学的批判精神、创造精神与社会抱负。大学是精神财富的生产者,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己任,大学培养的人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与价值观。校庆就是展示并弘扬这些思想的重要舞台,是对学生进行大学精神教育的理想场所。但许多大学校庆,形式上奢华高调、隆重热烈,本质上要么官僚气十足,要么铜臭味弥漫,成了俗不可耐的赤裸裸的名利场。这样的校庆,不要也罢!

(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孔 昕
美 编:马晓迪